

刘放桐 自选集

上 / 海 / 著 / 名

学 / 者 / 文 / 集

重庆出版社

上 / 海 / 著 / 名 / 学 / 者 / 文 / 集

刘放桐 自选集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放桐自选集/刘放桐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上海著名学者文集/李书敏主编)
ISBN 7-5366-4556-2

I. 刘… II. 刘…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5600 号

责任编辑 颜尚贤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刘放桐自选集
上海著名学者文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插页 5 字数 376 千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7-5366-4556-2/B·99

定价:30.00 元



作者像

作者小传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共党员。1934年5月2日出生于湖南桃江。1950年入湖南大学经济系,1954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旋即去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任助理编辑。1957年初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作西方哲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初毕业后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先后担任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及有关西方哲学的多种专题课程的教学。1984年由国家教育部特批为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领衔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立现代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点,任博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的博士生已达21名(包括在学)。

50年代作研究生时重点研究西方哲学史,60年代开始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在国内外出版有《现代西方哲学》、《实用主义述评》等独著和合著的有关西方哲学的著作十多种,发表论文约百篇,共200余万字。其中《现代西方哲学》(1981年初版,1990年修订版)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先后获上海市、国家教委和国家级优秀教材奖。《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等多篇论文获各种全国性奖。曾到美欧日等国访问,参加和主持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

目前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学科组成员;全国高教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等。

前 言

应重庆出版社之约,我编了这部自选文集,定名为《探索·沟通·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历程》^①。这个名称对内容的选择作了双重限定。第一是只选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论著;第二是只选能体现我个人近20年来关于本学科的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和变更的论著。

从1957年作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起到“文革”前不久的近10年内,我陆续撰写和发表过一些关于西方哲学史的文章。从总结我个人学术生涯说,这些文章不无意义,但它们不符合这本选集的上述主题,自然不选入内。

从1961年到复旦工作起,我的研究重点已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在“文革”前几年中,除了收集和编译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资料外,还写成了部分文稿。它们为我后来编写《现代西方哲学》作了必要的准备。但当时公开发表的只有关于文德尔班、柏格森等人的哲学的少数几篇文章,在哲学界谈不到有什么

^① 此为本书稿原名,出版时按《上海著名学者文集》丛书要求,改用现书名。

影响,也不拟选入。

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在中断了近30年后于70年代末重新恢复。我关于本学科的论著绝大部分也是在这之后问世的,约有200多万字。我个人这20年的研究是在我国本学科这一时期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为了使这部文集具有较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想编入的文章最好不仅能体现我个人在不同阶段对本学科的基本观点,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体现我国本学科前进而又曲折的发展轨迹。

抱着这一宗旨,我选编了下列五组文章。

第一组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版和修订”。这部教材无疑是我最有代表性的论著。它的三个版本可以代表我个人这一时期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但我不便把本书的具体内容选入,而选了几篇能体现这三个版本的指导思想的文章。

第二组是“探索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为了使自己的学科研究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一直关注对本学科方法论问题的探索。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最能体现我对本学科的基本观点及其变化和发展。我选择了五篇文章列入这一组。

第三组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和实用主义研究”。在各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特别是实用主义是我的研究重点,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占了我的全部论著的很大部分。其中有的论著(例如具体研究几位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学说的论著)较专门,篇幅也较长,难以收入本文集。现在所选的几篇文章也许最能体现我这方面的基本观点。这一组文章可以作为对前一组的具体补充。

第四组是“西方哲学思潮与中国现代化”。我一直认为,我们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答现代化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现实问题,特

别是有关道德、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我选了六篇文章列入这一组。

最后一组是关于本专业人才培养的。由于我给博士研究生的论著所写的一些序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故选了四篇列入这一组。

上述各组的划分是相对的。有的文章也可以不放在所在组而放在其他组。我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分成这么几组而从不同方面体现我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以及我关于这方面的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和变更。我一直认为,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首先要不断地对之加以探索,消除对它们的误会,了解其实际所是;其次要善于从现代西方社会及其哲学的基本方向的大背景下来揭示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达到相互沟通;然后在这一基础上超越它们本身的界限,使之服务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这也是我把这部文集定名为《探索·沟通·超越》的主要含义。

需要说明的是:对入选的文章,除了已发现的个别错字外,我几乎未作任何改动。我当然知道,在我过去的一些论著中,在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知识性的阐释和理论分析上都必然存在缺点甚至错误,它们是我当时在学科知识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上的局限性的写照。我现在当然可以将这些文章修改得好一些。但为了显示历史的真实性,我还是将它们原样保存。我想我不应当掩饰自己过去的缺点和错误,而应注意从发觉和克服过去的缺点和错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得到提高。

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过去的20年中尽管经历了不少曲折,但还是取得了极为重大的进步。可以肯定,它在往

后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将会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更为积极的作
用。在我国本学科的建设中,我个人的工作只是沧海之一粟。
我愿将个人余生的精力投入这一事业中,继续为学科的发展
贡献绵薄之力。

刘放桐

1999年1月10日于复旦大学

风雨中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代序)

我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已逾 40 年。把其中的现代部分作为研究重点也已有 30 多年。谈不到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贡献和建树。不过,自 5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这一领域研究中所出现的种种风雨,我大体上都经历了。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谓与之息息相关。因此,当我回顾自己这些年的学术生涯时,仿佛又一次听到了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这 40 年来的前进但又有些曲折的脚步声。我既为它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而感到庆幸,也为它所受到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受到的种种扭曲和误解而感到遗憾,但更为它今后将会获得的更大发展以及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可能起到的更大积极作用而充满希望和信念。

一 踏入西方哲学研究之门

我出身贫寒。小学毕业后只断续读过两年中学,大部分中学课程靠自学完成。这自然要经历更多艰辛,需要有勤于思索的习惯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但也由此使我在意志和性格上得到了较好的锻炼。1950年我以同等学力身份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其实我原来最感兴趣、根基也较好的学科是数学和物理,选读经济学带有很大盲目性。然而,正是对自然科学曾有所涉猎,又学习了4年经济学,才使我在走上哲学研究道路后能有较广阔的视野。

我最初接触哲学是湖南大学经济系开设的哲学课程。记得最早给我所在班级上哲学课的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杨荣国教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名前辈李达校长在全校讲解他的《实践论解说》时我们也去听讲。两位名家的讲课都很深刻,杨荣国教授讲课时总要穿插一些中国哲学史的典故,很是生动,我和不少同学都被吸引住了。尽管由于我过去从未接触过哲学,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对他们讲的具体内容很多都未能听懂,却仍然由此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毕业后我初在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工作。业余阅读的书藉除了经济学的外,多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关于哲学方面的。1955年下半年起,国内由上而下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运动。有关批判文章可谓铺天盖地而来。这些文章的基本理论框架几乎一致,都是指责实用主义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帝国主义反动哲学。但它们对实用主义的具体内容都语焉不详,至少我难以从中悟出个究竟来。现在回头来看,那场批判可谓开了以“左”的政治压力来干预学术讨论的先河。但我当时对这场

批判的政治和理论含义并没有真正理解,甚至也没有去多想这方面的问题。它只是促使我萌发了较具体地学一点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的念头。一次在旧书摊上偶然买到一本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薛格洛夫编的《西方哲学史简编》。其中虽无对实用主义的详细介绍,但也许是由于它是我读的第一部西方哲学史,发觉其中有对各种哲学思潮的介绍,比当时书店里可能买到的哲学读物内容要丰富得多,因而很为其吸引。后来我又找到了两本解放前翻译出版的梯利及韦伯的《西洋哲学史》。读后更感另有天地。由此产生了对西方哲学有更多了解的意向。1956年,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少数有条件的大学开始招收授予学位的正规研究生。我正想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决定报考。按原来所学和所长,我自然应当报考经济学,但怀着试试看的心里,我改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想不到居然被录取。就在这年年底,我进了人大,从此开始了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生涯。

我在人大学习的重点最初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尤其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感兴趣。这与著名的希腊哲学史家苗力田教授的引导有关。当时正好买到一本 Warrington 重编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英译文字流畅好读。我那时的英语阅读能力虽不高,大体上还看得懂。苗先生要我硬着头皮反复读下去。我照着作了,还写了一些笔记。尽管我并没有都读懂,但它仍使我对希腊哲学有了较多的了解,特别是给了我较严格的思维训练,受益不浅。不久,我转向经验论和唯理论,着重阅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一些长进。除了参加人大哲学史教研室的西方哲学史教材的编写外,还写了多篇论文和读书报告。其中关于亚里士多德认识论和斯宾诺莎唯理论等篇后来都公开发表了。这些东西学术

水平都不高,在当时我国哲学研究领域中之然不会有有多大影响。但它们鼓舞并增强了我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信心,对锻炼我的科研能力更大有好处。在往后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把认真阅读原著和勤于练笔当作治学的两条原则。尽管我在这两方面都作得不算好,但我仍然觉得这二者兼顾是成功的治学所必不可少的。

人大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环境,使我一开始走上西方哲学的研究道路,就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并力图把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我始终觉得这是在我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我个人的研究来说,如果还能说多少有些成绩,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这方面作了较大努力。

但是我又觉得,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从50年代起就已一再出现严重的失误。这主要表现为政治和思想领域内的左的倾向经常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驱使人们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记得1957年初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会。我国哲学界许多著名专家发表了各有特色的意见。这次会议对像我这样刚刚走进哲学史研究之门的年轻人很有启迪。然而这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不久就被通过政治手段简单否定了。好几位先生因为所发表的意见不符合当时的“左”的政治气候而被指责为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甚至在政治上受到追究。随后,在中国哲学界掀起了一阵所谓“拔白旗”之风。由于这股“左”风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刮起来的,我和许多青年同志一样也卷进去了。写过几篇批判文章。记得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就“批判”了我国一位最著名的现

代西方哲学专家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回头来看这些文章,觉得自己那时实在太幼稚无知。倒不是认为对权威专家的学术思想不可批判,而是因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知无几,对西方哲学刚刚接触,连其皮毛也知之甚少,居然拉着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来指点专业领域研究的是非。这岂非太不自量力!遗憾的是,这种对自己所不懂或懂得很少的东西横加批判的极不踏实的学风,在左倾思潮支配的时期,反而往往被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受到鼓励,以至泛滥成灾。这种学风在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非常盛行。至今在某些刊物上,有这种倾向的文章仍不罕见。这大概可以算是“左”的思潮在我国学术界所造成的一大公害吧!只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可能受害最深。

二 艰难岁月

1960年底,我作为副博士研究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四年学习期满,分配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从1961年初至今,我在复旦已工作了近40年。

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是由我国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全增嘏教授建立起来的。我1961年初到复旦后即在他的指导下工作。那时他正给本科毕业班学生开设现代西方哲学(当时叫做“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课程。尽管他讲的相当简单,但作为一门课程开设,在我国解放后可能是最早的(由于左的干扰等原因,兄弟院校一直到80年代初才系统开设)。他起初要我担任这门课的学生辅导。一个学期后要我接替他承担整个课程的教学。这可以说是我从事现代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的真正起点。

我到复旦以后的工作范围当然不限于现代西方哲学。来

复旦之初,我协助全增嘏先生修改了由他主编的《辞海》哲学卷外国哲学分卷,部分条目由我负责新写。我还担任过“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专题”(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专业课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1962—1964年间,除了兼顾复旦的教学外,我还被借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了不少科学哲学的材料,还编译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其中部分后来内部出版了。这些工作并不都直接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但它们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扩大了我的知识面,而且提高了我独立从事不同课题研究的能力,这对我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一直认为,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一定要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这不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而且是说必需有较为丰富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哲学的其他分支的知识。我国许多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卓具成就的专家都有这种特点。尽管我个人在这方面作得并不好,但我一直力图这样做,后来也要求我的研究生这样做。

不过,从60年代初以来,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上。当我从全先生那里接受了这门课程的全部教学任务后,我就制定了逐步把这门课程较系统地建立起来的计划:先拟订系统的教学大纲,然后编写出较完整的讲义,在此基础上编写出较好的教材。然而当我具体着手这样做时,又感到困难重重。

首先是存在着政治上的风险。

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当时几乎被公认为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在评述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认为是传播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甚至引出政治上的麻烦。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反右和“拔白

旗”等运动中出现的那些政治批判事件历历在目。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知识基础和理论水平比我高深得多的兄弟院校的同行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因此,从事这项工作必需时刻注意防止在政治上受到追究。正是这种顾忌,使我那时无法越出“左”的批判框架。

其次是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原有基础极为薄弱。

尽管一些前辈学者早在解放前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一些西方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意志主义、生命哲学、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有所介绍,但大都较为零碎,并未形成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从50年代初起,由于“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极少有人再涉足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原有人员也大多转向哲学史等其他领域。除了因政治需要发表的批判文章(例如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批判)及供批判用的作为反面材料出版的少量西方哲学家的论著外,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之作,各大学哲学系均不开设本学科课程。本学科的研究实际上被中断了,形成了事实上的空白局面。为了把本学科作为一门课程建设起来,在尽可能吸取前人和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同时,必须有从零作起的思想准备,对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一个一个地从头加以研究。我自知根底浅薄,智力平庸。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在60年代的头几年中,为了建设好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程,我可谓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也取得了较多成果。到1964年,不仅这门课程的开设较为完整了,而且已编写出了较系统的教学大纲和相当一些流派的讲义。个别部分还经过整理公开发表。当时已和一家出版社约定在1967年以前编写出一本较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来。然而,正当我的计

划在顺利进行、可望按期完成时,国内政局剧变。1964年年底,我被抽调去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四清”的“左”的路线进一步发展了,接着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本来就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现的现代西方哲学,这时更进一步被否定了。在中国学术界,几乎没有人再敢公开谈论它们的实际所是。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也不仅被迫完全停止,原已写成的书稿和收集的材料相当一部分也在那个一片恐怖的年月因种种原因而被丢失。然而我这几年的工作没有白费。已作过的工作在我头脑中毕竟留下了较深的痕迹,更重要的是那几年的艰辛对我的意志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三 《现代西方哲学》的风雨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左”的路线得到纠正,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实行。现代西方哲学也得以重新进行研究,尽管还有不少障碍,甚至还存在着各种风险,但总的说来,条件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这使我有机会恢复和继续被迫中断了十多年的工作,我也决心在这方面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这首先是编写出一本较为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来。

要完成这项目标并不容易。主要有两个困难。一是对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二是对评价标准难于掌握。

重新开始工作之初,国内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材料仍很短缺。经过系统整理的材料更少。不仅没有系统的论著可供参考,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也不多。当时一些同行朋友认为我国暂不具备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教材的条件,主张再等五六年才考虑。从编写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教材的目标来说,这些意见无疑是求实和中肯的。然而,鉴于当时本学科处于百